

浮出水面的北一輝

• 盛邦和

北一輝是日本現代右翼思想的總頭腦，加速日本軍國主義化的罪人。然而，北一輝竟然是「社會主義」者，一個偏袒社會底層的「左派」。不同的概念衝撞在一起，給北一輝披上神秘的色彩。如何評價北一輝，如何解釋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身份。這使沉寂多年的北一輝重新浮出水面。

圓睜的半盲的眼睛，直視着日本，也覬覦着亞洲與世界，這是北一輝——日本現代右翼思想的總頭腦，「二二六」兵變的策劃者，加速日本軍國主義化的罪人。對於北一輝，人們早有蓋棺之論。然而，北一輝竟然是「社會主義」者，一個不與資本妥協，偏袒社會底層的新興左派。不同的概念衝撞在一起，給北一輝披上神秘的色彩。如何評價北一輝，如何解釋出現在同一人身上的截然不同的思想身份。這使沉寂多年的北一輝重新浮出水面。

年輕時曾是早稻田大學聽講生的北一輝，當初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走上社會。他眼看日本走上命運的交叉路口，落入內憂外患的激流旋渦，開始萌生「改造日本」的理念。1906年，二十四歲的北一輝「憂國」振筆，自費出版第一本著作。這就是給當時日本帶來震動的《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這本書僅發行五天，就遭到查禁的命運，然而思想已經播揚。他另有《支那革命外史》與《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等著作流傳於世。

一 「左派」立場與「底層」主義

《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表面看是一部「社會主義」論著，一部批判資本主義的宣言。日本國體被設定為首選的攻擊目標。作者指出：「國體」規定的天皇具有多重性格：其一是「現人神」，是「無謬的神」（從不會犯錯誤的神）與「國民道德」的「最高典範」，然而同時又是國家元首與最高政治責任者。神聖定位規定天皇總是正確，而世俗定位又決定他難免錯誤。「天皇為神」與「天皇是元首」，發生無可避免的「二元」悖論，形成日本國體的致命要害。《明治憲法》是欽定憲法，必須絕對服從，憲法規定的國體無可質疑，天皇權威至高無上。《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指責憲法，議論國體，質疑神聖，這就需要政治勇氣。無怪乎言論一出，作者即被「特別高等警察」注意，被寫上黑名單。

北一輝在《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中披露社會底層的悲慘遭遇，對

之寄予同情與希望；他揭示財閥官僚的奸邪罪惡，對之投以鄙夷與憤怒。他立論：底層在呼號，日本在遇難，千鈞一髮的內外交加之危機，有待「社會主義」的挽救。撇開固有的成見，從《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我們看到的或許僅是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路遇不平的憤世嫉俗。哪裏知道，就是這個青年人會在此後的日子裏，發出轟然巨響，成為日本現代史上法西斯的「魔王」，而這個魔王舞動「魔爪」的第一招，起因竟是出於對「底層」命運的慈悲「關懷」。

繼《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北一輝又發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社會主義」思想進一步擴充^①。打開《法案》，鼓吹底層主義的「革命」氣息撲面而來。

第一卷中有以下諸節：憲法的停止、天皇的原意、華族制廢止、普通選舉、國民自由的恢復、國家改造內閣、國家改造議會、皇室財產的國家下附。

卷二「私有財產限度」的內容關於：私有財產限度、私有財產限度超過額的國有、改造後的私有財產超過者、在鄉軍人團會議。

卷三「土地處分三則」論述以下問題：私有地限度、超過私有地限度土地的國納、土地徵集機關、將來的私有地限度超過者、徵集的民有制、都市的土地市有制。

卷四「大資本的國家統一」有以下內容：私人生產業限度、私人生產業限度超過部分的國有、資本徵集機關、改造後私人生產業限度超過者、國家的生產組織等。

卷五「勞動者的權利」則對勞動省的義務、勞動薪金、勞動時間、勞動

者的利益分配、勞動的株主制的立法、借地農業者的擁護、幼年勞動者的禁止、婦女勞動等問題表示強烈的關心。

北一輝的著作折射出「底層」關注的正義。這樣的「正義」精神大體表現為以下諸端。

一、指證日本存在着兩個基本社會階層。一個是社會上層，由軍閥、財閥與政閥組成。一個是社會底層，由工人、農民與城市貧民組成。底層大眾無資本、無權益，社會弱者悲苦無告。由此他訴諸社會人格的平等與財富分配的均等。他的思想似乎漫溢着對社會公平的追求與人類正義的張揚。他認為要解決社會底層的基本困境，建立「純正社會主義」的原則是

北一輝(圖)在《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中披露社會底層的悲慘遭遇，寄予同情與希望；他揭示財閥官僚的奸邪罪惡，投以鄙夷與憤怒。從此書中，我們看到的或許僅是一個入世不深的青年路遇不平的憤世嫉俗。其後北一輝又發表《日本改造法案大綱》，打開《法案》，鼓吹「底層」主義的「革命」氣息撲面而來。



北一輝曾應宋教仁之邀參加中國革命，親身經歷使他感悟中國那場革命即由「新軍」中的革命力量促成。北一輝看到，軍隊也有上層與底層的區別。軍中的上層官僚不可信用，能夠依靠的只有下級官兵。為了進行日本的「革命」，他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拿槍的大眾——低級軍官身上，而此後發動的事變也純屬軍隊的政變。

唯一可行的道路。這使人想到哈耶克(F. A. Hayek)，他年輕時也嚮往社會主義，曾將社會主義定義為「社會的公正」與人類政治經濟活動的理想方案。然而他很快就發現，「深藏在多重偽裝之下的社會主義」是「現代文明的最大威脅」。因為「社會主義」將摧毀「個人自由與責任感的基礎」，「造成社會的貧困」，更嚴重的是「(遲早)導致集權主義政府」^②。然而對北一輝來說，他要求的就是這樣的「偽裝下的社會主義」，社會的正義要求是他追求的要義，即使導致專制與自由的被剝奪也在所不惜。更何況，他政治追求的本來目的就是捨棄「虛偽的民主」，建立足以統率日本的堅強政府。

二、關於革命的對象。軍閥、財閥與政閥是社會的蠹蟲，佔有最大量的社會資源。他們壓迫社會底層，不可容忍，理應成為革命的對象。

三、革命的方法與目的。北一輝的「社會主義」將以階級戰爭與「革命」戰爭鏟除社會的蠹蟲，實施昭和維新，最終實現日本「社會主義」。

四、「革命」的力量。「革命」的基本力量是社會底層大眾，而軍隊則有希望轉化為最有活力的力量之源。這很可能是受到中國辛亥革命的啟發。北一輝曾應宋教仁之邀前往中國參加革命，親身經歷使他感悟中國那場革命即由「新軍」中的革命力量促成。北一輝看到，軍隊中也有上層與底層的區別。軍隊中的上層官僚不可信用，所得利益已使他們蛻變為腐化腐敗的蠹蟲，能夠依靠的只有軍隊中的底層——下級官兵。他要進行的「革命」是「底層的革命」。也就是從這樣的思想出發，為了進行日本的「革命」，他

的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拿槍的大眾——軍隊低級軍官的身上，而此後發動的事變也純屬軍隊的政變。

五、關於亞洲主義。他說「革命的社會主義」將組合起偉大雄壯的「亞細亞聯盟」，結成「革命」的陣營，與英美帝國主義作殊死鬥爭。他的民族主義思想表現在他對亞洲主義的闡發上。他強調日本民族利益與亞洲利益緊緊無隙，日本將因亞洲的「覺醒」與「解放」獲得自身的勝利。北一輝一生的活動與大川周明密切相關，他的思想與大川周明的亞洲侵略主義如出一轍^③。

中世紀社會由兩個基本層組成：底層(農民、工人等)一政權層。至資本主義，社會層面細化為三：底層(工人、農民等)一中層(市民、中產階級)一政權層。社會由單純的二層構造，演化為複雜的三層構造，這是歷史的進步。如此狀況，給社會帶來三大「現代性」變革：一是產生「三角」支撐的嶄新政治力學；二是出現因中層(市民、中產階級)發生的「專制阻滯」。中層的阻隔，迫使「上」對「下」的管制，無法沿用中世紀肆無忌憚的「專制」形式。三是「中層」給社會帶來新的思想血液，如市場、產業、重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等等。人們所注目的「現代性」理論，大體屬中層所有。市民(中層)以自由主義為標識，衝擊中世紀，贏得政權，同時也用同樣的思想建立市民政府。這樣，國家統治層日益市民化，與「中層」利益逐漸吻合一致。資本社會的根基為市民社會，其旗幟為自由主義。

面對資本社會的既定模式，人們的思想分成「左派」與「右派」。可將右派思想視為「護體制」思想，將左派思

想視為「反體制」思想。一切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都站在「底層」的立場上，他們也被稱為各類「左派」。

廣而言之，標榜自己是左派的還有以下諸派別：民粹主義、民主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當然還有一個另類的形左實右的「左派」——法西斯主義。從上面的意義來說，北一輝帶給社會的影響彷彿不屬右派，而屬於左派。北一輝沒有維護日本現有政權體制的打算，他要的是改造日本，並從改造國體首着先刀。他質疑天皇制度，投以不容情的批判，表現與既成體制分流的決心。

他的思想立腳點不在社會的中層與市民，依他自己表白是站在工農與城市貧民即社會基層的一邊。他對日本市場制度只有憤慨，直言如此的資本秩序，造成日本財閥暴富，民眾赤貧。他所宣揚的階級「革命理論」就是要打倒財閥，連帶掀翻一切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一輝似乎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的敵人，財閥的敵人。

北一輝在《國體論與純正社會主義》中自稱，他所主張的既是民主主義又是社會主義。但所謂社會主義，「不是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所謂民主主義，也不是盧梭的民主主義」。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這是一則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北一輝關於本人政治態度的明確表態^④。既然如此，他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已經絕緣。同時，他肯定不是自由主義。他認定資本、自由與民主聯成一氣，全然是虛偽與造作。揭破西方價值成為他的人生使命。

他也不是貨真價實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一個人的宣言往往不反映他的真實。1919年日本發生很有聲勢的民主「普選運動」，而北一輝主張廢除選舉的《改造法案》，也在這一年脫稿。他否定議會制度與政黨政治，要求「建立在國民全體的意願之上的全體政治」，即：「天皇中心的政治」。他要的是「全體主義」與「絕對主義」的政治。他要將專制作為實現日本改造的主要武器，他要的是「超國家主義」^⑤。這一切已經離開社會民主思想很遠。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堅信議會萬能，不十分強調階級鬥爭，更不主張「革命戰爭」。由此，北一輝思想已經與他自認的社會民主思想錯位，顯示出撲朔迷離的異樣特質。

分析北一輝思想，讓人們想起民粹主義。當世界走入現代化的時候，許多國家都先後出現過民粹主義，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然而在十八到十九整整兩個世紀中出現了科貝特 (William Cobbett) 等不少民粹思想家。十八世紀有法國邁斯爾 (Joseph de Maistre) 等人宣傳民粹主義，德國的赫德 (Johann Gottfried Herder) 等將本國強烈的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結合起來，具有甚大的思想鼓動力。在東方，印度有古斯 (Aurobindo Ghose) 等思想家，中國有梁漱溟，他們的思想與民粹思想有很大的內在關聯^⑥。各國民粹思想家有所不同，但基本特徵都是宣稱自己站在「底層」的立場上，是社會底層的利益代表者與發言人，在歷史上他們扮演着窮人的「天使」，富人的「惡魔」的角色。他們對資本主義提出嚴苛批判，認為工業化給社會帶來無窮弊端，其內在缺陷是不可克服，世界走向現代化是歷史

北一輝聲稱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否定議會制度與政黨政治，要求建立「天皇中心的政治」，這一切已經離開社會民主思想很遠。他與民粹派的思想具有相近而親的特點，尤其是在反工業化、反西方化以及反社會「壓迫」方面，將民粹派反現代化性格推演到極致。

的錯誤，給社會底層帶來最大的打擊，整個社會將因分配不公、兩極分化、道德澆漓、人際關係疏離與對立等負面因素的無法逆轉的擴大而最後瓦解，進而導致人類墮落。他們美化前工業社會田園詩般的圖景，呼籲覆滅現代秩序，表達反現代化與工商化的左派底層主義的態度。北一輝與民粹派的思想具有相近而親的特點。尤其是北一輝在反工業化、反西方化以及反社會「壓迫」方面走得更遠，將民粹派反現代化性格推演到極致。他制定暴力革命與階級鬥爭的思想方案，提出動用軍隊力量「改造日本」的明晰化主張，已經跳出民粹主義普通意義上的激進主義窠臼，達到更上層樓的地步。北一輝不像民粹派，因為他更極端、更暴力、更專橫。

希特勒曾將原「德意志工人黨」，加上「民族社會主義」的概念，改名：「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約簡則為“Nazi-Partei”，即「納粹黨」。他打的旗號是民族、國家、社會主義。民族社會主義的德文縮寫為“Nazi”，成了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即法西斯的專用符號。

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一書中曾分析德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及民族主義的關係，指出「德國傳統中的獨裁主義、國家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融合，是由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來完成的」，這個融合過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到達頂峰^①。回望北一輝，他主張極端的「民族」，標榜超國家的「國家」，關懷最底層的「社會」，他在做着東亞桑巴特的工作，將日本的獨裁主義、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融合起來。他的工作很有

成效，取得的「成績」不亞於德國知識份子。

二 行動指針：階級論、民族論與戰爭論

北一輝強調：日本當下存在着「嚴重的階級鬥爭事實」，即國內的階級鬥爭與「地球的」(國際的)階級鬥爭。國內階級鬥爭是平民與財閥、官僚的鬥爭；「地球的」階級鬥爭是被壓迫的日本民族與歐美帝國主義的鬥爭。他反覆論證階級矛盾的現實性與其不可調和的尖銳性，而這正決定「革命戰爭」的不可避免。

北一輝的民族論是其階級論的國際引申。東亞聯盟同志會的《宣言》說白了北一輝的政治理念。同志會強調「民族主義」：明治維新做到的是「打倒封建，實現以天皇為中心的民族國家。而昭和維新則綜合與發揚東亞各民族的力量，通過最終的戰爭迎來世界維新」。他們所說的民族不僅是日本民族，而是東亞民族，將由東亞民族的崛起與抗擊歐美，實現以日本為中核的世界帝國。

顯然，從底層主義到戰爭主義，然後經由民族主義到集權主義，這樣就完成了北一輝「底層主義」的全部思想邏輯與行動進路。有兩個概念的「實行」，足可以葬送市民運動的一切成果，至少可以造成社會的倒退與中世紀的一時復辟。一個是「民族」，一個是「底層」。當民族遇到危機，社會必有緊縮，市民必有忍讓，自由必做犧牲。當底層遇到危機，自由社會也必無奈地「倒退」。發育不良的市民社會因其民族與底層危機而發生歷史倒

有兩個概念的「實行」足可葬送市民運動的一切成果。一個是「民族」，一個是「底層」。當民族遇到危機，社會必有緊縮，自由必做犧牲。當底層遇到危機，自由社會也必無奈地「倒退」。二戰前的德國已經成為市民社會，但當「民族」與「底層」成為最動人醒目的文化符號，歷史驟然倒退。當時希特勒用的口號是底層與民族。北一輝用的也是同樣的口號。

退，一點也不足為奇。二戰前的德國已經成為市民社會，但當「民族」與「底層」成為最動人醒目的文化符號，歷史驟然倒退。當時希特勒用的口號是底層與民族。北一輝用的也是同樣的口號：底層與民族。

北一輝的《支那革命外史》出版後，大川周明說：「北一輝的支那革命觀與他在中國的活動情況都在書中得到敘述」，「本書刊行的時候，吉野作造博士◎讚揚這本書是『論中國革命史的最傑出的一本書』，作者不僅對支那革命作嚴肅的批判，而且為解說支那革命，縱橫馳筆，寫到法國革命與明治維新。他古今東西的議論，提示了革命原理，具有無可比類的特色。我亦由此受益不淺。」

他說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到北一輝獨到的歷史觀。例如學術界一般都對「大西鄉的西南支變」抱反對的態度，認為其性質是反動的。而北一輝卻堅持不同的態度。北一輝論西鄉事變，是對當時倒退逆流的抗議，是繼明治維新之後的「第二次革命」。正因為「革命」失敗，才導致日本腐朽官僚政治的抬頭。他反對從西歐尤其從德國輸入制度模式，認為這是「腐根結朽木」，其結果是製造一個「中世紀的日本」。為此，日本需要「第三次革命」，革命的勝利，將給日本帶來「民族的更新」◎。

北一輝在一些表述中呼籲戰爭與革命的理論。他痛恨「日本既有的和平」，這樣的和平「比戰爭更加可惡」，維持這樣的和平是一種「非德」。他斷言「人在本質上是卑劣的」，由此釀成社會的不平與骯髒。事實決定戰爭將不可免，如暴雨之清洗污垢，戰爭將還宇宙一個清潔的世界。他大聲呼

籲，一切嫌惡戰爭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對戰爭當抱有愛意。

他說：人在戰爭中將獲得自我療救的萬能良藥。戰爭帶來的不是恨，而是人類普遍的愛。戰爭使人類的愛得到高揚，會像課堂一樣，教育人民相互尊敬，進而獲得國家的空前團結，贏得民族的緊密團聚。「在現代，戰爭是絕對不可缺少的」，「沒有戰爭，人類將自取滅亡」，變為不潔的泥土，沉淪地獄。因而，戰爭就是「革命」，人民引頸盼望，如大旱之望雲霓。這裏北一輝所說的戰爭固然有人們通常所說的侵略戰爭的意義，其實當中包括很大的國內戰爭的意義。他表彰的西鄉事變就是國內戰爭。他要通過國內戰爭來徹底清洗「污濁」的日本社會。

他的思想與軍隊底層中固有的「革命」思想發生結合呼應的關係。西田稅(1901-37)組成以青年軍官為核心的「天劍黨」，要「以軍人為基礎」，「以《日本改造法案》為經典」，鑄成實行之劍。日本改造的思想在走向行動中。其既是一種思想，也是一個行動綱領，並有組織作它的後盾與行動的武器。

1919年，北一輝、大川周明組織「猶存社」。平沼騏一郎為會長的「國本社」有會員二十餘萬人。1923年，法西斯軍官永田鐵山、岡村寧次、小敏四郎、東條英機等糾集一批佐級幕僚軍官，成立了日軍第一個法西斯組織「二葉會」。其後，「木曜會」、「天劍黨」、「王師會」、「一夕會」、「愛國社」等法西斯軍人組織相繼出籠。1930年9月，日軍參謀本部少壯派軍官橋本欣五郎等成立了日軍最大的法西斯組織——「櫻會」。

北一輝大聲呼籲，一切嫌惡戰爭的想法都是錯誤的，對戰爭當抱有愛意。1939年，東亞聯盟同志會發表《昭和維新論》，其中已經將北一輝的戰爭論引申到所謂「最終戰爭」的理念，明顯轉向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的理論上去，指出這是一場動員全體國民的「決戰」，將延續二十年之久，最終達到「世界統一」的目的。

1939年，東亞聯盟同志會發表《昭和維新論》，其中已經將北一輝的戰爭論引申到所謂「最終戰爭」的理念上去。出現了明顯的世界戰爭理論轉向，即轉向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的理論上去，指出這是一場動員全體國民的「決戰」，將延續二十年之久，最終達到「世界統一」的目的^⑩。

北一輝籲求神鬼般籲求戰爭，一旦他的思想有人認帳求購，日本立即魔雲翻滾，戰爭果然來了。這就是以底層軍官出面，代表日本底層主義的「二二六」兵變，就是侵略亞洲的「大陸戰爭」，就是直接打擊英美的太平洋戰爭。他的戰爭既是對外的戰爭，是對英美「惡鬼」戰爭，是對英美「世界性階級壓迫」的戰爭，是對由英美「自由」精神的戰爭。他的「戰爭」也是對內的戰爭，是國內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對財閥、政客的戰爭，是消滅市民的戰爭，是將市民社會拉向中世紀的戰爭，是搏動社會動盪的戰爭。他的戰爭是「專制」戰勝「自由」的戰爭，是要在日本、東亞乃至世界重建「統制主義」帝國的戰爭。

三 直接危害：現代化停滯與專制復辟

兵變失敗後，北一輝被天皇政府處死。然而，北一輝的思想與兵變的影響卻因為他的死而得到更大的擴散。日本的政治情況也因此發生急劇變化。

一、桀驁不馴的軍部勢力，從伏流蓄勢狀態一躍而起，成為日本政局的執牛耳者。

二、日本政黨力量轉而衰竭，馬

克思主義力量與自由主義勢力一道因為政局的激轉，備受擠壓與迫害。

三、輿論空間陡然受壓，思想的公共領域因政局的變化，被迫消失。

四、大正時代一度獲得發育機會的憲政議會制度，實質上趨於消亡。軍部上台，日本進入明治維新以來最專制的黑暗時代。

五、極具戲劇性的是北一輝與大川周明的亞洲主義大行其道，極端民族主義走上前台，侵略主義成為日本的基本國策，其最直接的結果是日本的民主主義退潮與專制主義的復辟。

東亞聯盟同志會的《宣言》提出過「統制主義」的理論，其中說：昭和維新是統制主義的革新。在近代政府的管理形式有三種：專制主義、自由主義與統制主義。「統制主義」是「自由主義與專制主義諸指導精神的綜合開顯」。《宣言》說專制的時代過去後，世界會出現自由主義，然而其缺陷日益顯現，歷史決定日本將走上「統制主義」的時代。並指出：「從專制主義到自由主義，然後到統制主義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向。」《宣言》所說的統制，不管繞了多大的思想圈子，其本質還是對封建專制極權思想的還原與復辟。這樣的思想與北一輝的政治主張完全一致^⑪。

處死了北一輝，成全了北一輝。北一輝的生命雖然終結，但他的思想卻變成了現實。日本的集權「統制」思想因北一輝的死亡而激活。這就是發生在日本昭和時代的真實事件，一個讓後世史家驚詫不已、詭異絕倫的歷史因緣。

明治維新是一場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政黨政治沒有得到充分的實

北一輝籲求神鬼般籲求戰爭，一旦有人認帳求購，日本立即魔雲翻滾，戰爭果然來了。這就是侵略亞洲的「大陸戰爭」，就是直接打擊英美的太平洋戰爭。他的戰爭既是對英美「惡鬼」戰爭，也是國內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對財閥、政客的戰爭，是消滅市民的戰爭；是「專制」戰勝「自由」的戰爭，是要在日本、東亞乃至世界重建「統制主義」帝國的戰爭。

現，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維新元老執掌朝政。以後又有山縣有朋、伊藤博文長期執政，議會權力十分有限，無法監督元老政治。然而日本畢竟還保持着議會與政黨政治的外殼，市民憑藉「憲政」的外殼，在做不屈不撓的權利抗爭。

大正時代，日本民主運動再次崛起，思想界出現多元趨勢，公眾領域有所開放，自由主義思想抬頭，社會主義得到發展。1911年美濃部達吉發表「天皇機關說」。1916年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發表〈民主論〉，為民主運動推波助瀾。「護憲」即維護憲政運動，是大正民主運動的中心政治內容。兩次護憲運動，一次發生在1912年底，一次發生在1924至25年。首尾相結，成為大正民主運動的起訖標誌。否定「統帥權獨立」，對《明治憲法》中的「天皇大權」作民主性的解釋，成為這場運動的重要內容^⑩。明治維新時代肇始的元老政治在這個時候衰景初現，政黨政治起而代之。大正民本運動，或直稱民主運動，是日本政治現代化難得的良性契機。

然而表象之下有隱患：政黨雖從元老官僚手中暫時取得組閣權利，作為絕對主義的元老政治勢力依然在加緊活動，侵蝕着政黨政治的生存空間；日本的軍隊更是一支暗伏的政治勢力。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爆發，使日本國內外矛盾日益尖銳。軍閥勢力因戰爭勝利而驕橫無理，任意解釋《明治憲法》中的「統帥權」，企圖形成「軍部獨立」體制。軍隊中盛行國粹主義、國家主義與絕對主義思潮，特有的民族使命感，讓軍隊感覺對內實行日本改造，對外爭取生存空間，是天皇賜予的神聖任務。

顯然日本出現三大政治力量：元老勢力、政黨勢力、軍閥勢力。由此，日本被迫在三大政治前途面前作出選擇：元老政治、政黨政治、軍閥政治。問題就在於，當人民還沒有來得及作出應有反應，以北一輝為精神領袖的「二二六」兵變搶先發出政治攤牌的槍聲。兵變後，日本大正時代的自由主義成果付諸東流，一切民主的努力化為泡影，強權成為真理，自由化為妖魔，政黨政治崩潰，民主道路被堵，軍部迅速登上獨裁的寶座，軍國主義體制最後完成^⑪。

四 留下的思考

我們要討論的是，為甚麼實踐北一輝「底層」思想的「二二六」兵變，居然成為引發日本軍閥上台、完成軍國主義的直接引媒？為甚麼「左派」思想會產生極右的結果？為甚麼「左派」「革命」會引出國家主義集權？為甚麼標榜「底層」的「革命」最終造成法西斯勢力的得勢？

我們還要思考的是：假如日本上世紀20-30年代思想軌跡確實依照下面的線路運行：「底層」主義鼓動—「左派」思想激揚—民族主義亢奮—「革命理論」詮釋—軍事政變實踐—集權主義實現，那麼，底層主義、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專制主義，它們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留給後世的教訓究竟是甚麼？同時，極右翼的真右派是怎樣打扮成左派登場的。所謂的「左派」是怎樣打着「底層」的旗號，最後欺騙了「底層」，剝奪了「底層」。一個現代化行進中的國家中甚麼是左派？左派是怎樣形成的？左派的歷史使命

為甚麼實踐北一輝「底層」思想的「二二六」兵變，居然成為引發日本軍閥上台、完成軍國主義的直接引媒？為甚麼「左派」「革命」會引出國家主義集權？為甚麼標榜「底層」的「革命」最終造成法西斯勢力的得勢？一切偽裝的「左派」的最終政治命運與專制集權有甚麼關聯？這些課題不是歷史的，而是現實的。

究竟是甚麼？一切偽裝的「左派」的最終政治命運與專制集權有甚麼關聯？這樣的關聯是怎樣形成的？也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不是歷史的，而是現實的。

註釋

① 大川周明曾對北一輝說，比較中國的革命，日本的革命應走在前面，催促他從中國回國。同年12月北一輝回國，並在第二年加入「猶存社」。1920年修改舊稿，改名《日本改造法案大綱》出版，給軍隊基層以極大衝擊。又參加大川周明「猶存社」，撰文猛烈抨擊政府，可見他與大川周明的關係。

②⑦ 甘布爾(Andrew Gamble)著，王曉東等譯：《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頁31。

③ 參考盛邦和：〈日本的亞洲主義〉，《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

④ 近藤秀樹編：《宮崎滔天、北一輝》，「日本の名著45」(東京：中央公論社，1990)，頁396。

⑤ 橋川文三認為：我們在這裏提出了超國家主義概念。對此，戰前的日本、德國與意大利都只說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直到戰後這樣的概念才發生變化，在國家主義的前面加上「超」的前置詞。我們無法知道最早使用超國家主義這個名詞的是誰，也許是英國或美國發明了這個詞，但可以肯定此概念的使用確將二十世紀法西斯主義的特點表達了出來。甚麼是「超」？也就是英語的“ultra”的意思，其原來的意思是「超乎尋常的、過度的與極端的」，又可以轉意為「極端主義者、極端份子、急進份子」等。因此如果我們說尋常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並不會引起大的社會與國際危害，則「超國家主義」與「超民族主義」體現的意義就不同，與原本「國家主義」、「民族

主義」出現極大的歧義。在英語中，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是同一個詞，都是“nationalism”；這個詞又是與“internationalism”相對的。一個說的是民族主義，一個說的是國際主義。見花田清輝：〈ウルトラの意味〉，《現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1卷·月報18》(1964年11月)。

⑥ 引自胡偉希：〈中國近現代的社會轉型與民粹主義〉，載李世濤主編：《知識份子立場：民族主義與轉型期中國的命運》(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頁349。

⑧ 吉野作造(1878-1933)，政治學者，東京大學教授，大正初年宣傳「民本主義」(民主主義)，組織民主論爭的輿論陣地，在知識界擁有巨大影響力。由此可見自由主義有時與左派竟然也可以結成暫時的聯盟。

⑨ 竹內好編：《アジア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9」(東京：筑摩書房，1970)，頁62。

⑩⑪ 〈昭和維新論〉，載橋川文三編：《超國家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1」(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386；387。

⑫ 呂萬和：《簡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頁240。

⑬ 應該說北一輝為日本超國家主義的完成奠定了思想的基礎。橋川文三在〈昭和超國家主義的諸相〉一文表達了以下的觀點：日本現代史上並沒有像德國與意大利那樣的明顯的「法西斯運動」，也可以說日本的超國家主義是漸進發生的，因此很難找到一個日本超國家主義誕生的契機式標誌。橋川文三：〈昭和超國家主義の諸相〉，載橋川文三編：《超國家主義》，「現代日本思想大系31」(東京：筑摩書房，1971)，頁7。

盛邦和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暨華東師範大學思想研究所、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